

他们为什么要从香港回来？

651
3=3-2

人民出版社



出版者的话

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社会？这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。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，我们一定要虚心地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，为我们所用，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另一方面，我们在学习外国的时候，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，必须有清醒的认识。为了给广大读者，特别是青年读者提供一些了解资本主义社会情况的材料，我社特编辑出版这本书。

本书的作者，大多在美国或其它资本主义社会生活过，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有切身的体会。这些文章把他们耳闻目睹、亲身经历的一些事实，原原本本地写出来。内容亲切、真实，有助于读者在比较中，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，能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，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。

编 者

一九八〇年二月

目 录

他们为什么要从香港回来？	汪康宝 顾兆和 张起平 (1)
访港归来话制度	徐文骥 (7)
探亲归来话香港	赵 旭 李 丹 (14)
漫谈美国社会	艾泼斯坦 (19)
他们看到的美国社会	侯蕙男 苗 奇 (35)
我看到的美国及其他	潘士弘 (40)
“人民圣殿”的悲剧	莫 非 (45)
祖国 您的儿女回来了	肖 岗 沈金梅 (58)
做一个堂堂皇皇的中国人	王昌煦 (63)
美国的家庭是怎样设法战胜通货膨胀的？	莱文译 (75)
美国的通货膨胀和职工收入	冯华修译 (82)
要全面比较两种社会制度	郑志昂 (95)

他们为什么要从香港回来？

——访辽宁省旅大市工人吴金海夫妇

汪康宝 顾兆和 张起平

解放军报编者按：究竟是社会主义好，还是资本主义好，这本来是不成为问题的。但是正如《红楼梦》里有句诗说的：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，由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在一个长时期里大搞假社会主义，流毒所及，使真正的社会主义也蒙受了耻辱。以致在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我们要费很大的气力，才能洗去层层污垢，让社会主义重新焕发出灿烂的光采。现在有的同志觉得社会主义似乎不那么优越了，资本主义也不那么腐朽了，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。看看吴金海夫妇在香港的见闻，我们不是可以深切体会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吗？当然，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比较穷，人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，但是我们相信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，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，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的，而且是一定能够改变的。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未来在向我们召唤，让我们满怀信心地朝着这个未来奋勇前进吧！

一九七五年申请去香港的辽宁省旅大市工人吴金海和爱

人朱照云，不久前相继回来了。有人不解地问：“听说香港工资高，生活好，他们为什么要回来呢？”当我们在访问中提出这个问题时，他们就此谈了自己的切身感受。

难以找到一个安定的职业

吴金海说，在香港说是有选择职业的自由，但要想找一个安定的工作却很困难。我到香港后先是找到一家洗衣房看烘干机，工作时间是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晨八点。因工作时间长、劳动强度大，又是打夜班，干了不到两个月，身体实在吃不消了，只好又到一家印刷厂开汽车。可是，这家老板因生意不好，已经两个月没给工人发工资了。听工友们说，这个厂可能要倒闭。我心里担心，干了一个月，就赶忙辞退，又到了熊洁工程公司开汽车。这家老板对工人态度特别蛮横。一次，我不得已和老板顶了一句嘴，从此他就处处找别扭，故意把刹车不灵的汽车给我开。我想离开，但签订的合同没到期，不干还得赔偿老板的损失，没办法只好花十元钱买了一张诊断书，告“病假”走了（在香港，工人一休病假老板就另雇人了）。后来，我又到了金华木材商店开汽车。在这家店里，我不光要管开车，还得自己装卸，还得看店卖货，一刻也不能闲着。就这样，不到四年时间，我就换了十一个地方。有人说香港比大陆好，有选择职业的自由。其实，那里有选择职业的“自由”，更有失业的“自由”。这种“自由”只能为资本家随意解雇工人提供方便，而对工

人又有什么好处呢？

朱照云说，在香港就是有大学文凭，有技术专长，要想找一个理想的职业也是不容易的。我认识大连机车研究所的一个技术员，到香港后干的是苦力。武汉水利学院有个助教在香港一家小厂当工人，和一般女工干一样的活。还有武汉电话局一个大学毕业的女技术员，到香港后，在我工作的一家电子厂里当普通工人，她常常后悔不该到香港来。

老板不把工人当人看

吴金海说，在香港当工人，经常忍辱受气。你是老板用钱雇来的，就什么都得听他的。我在工程公司当司机时，有一次老板让我把车开到三层楼高的土堆上卸泥，我说危险，他硬逼我开上去，结果翻了车，砸伤了脚，险些连命也送掉了。老板对此不闻不问，我只好自己雇了车到医院包扎，在家躺了两个多月才慢慢好起来。

吴金海接着说，这种事情不只是我一个人碰到，老板只顾赚钱，根本不管工人死活。在毛巾厂有一对老人，男的七十多岁，女的六十多岁，为了活命，每天起早贪黑地给老板干活。一次，老头在干活时动脉硬化症犯了，一头栽在地下，送到医院就死了。老太太由于精神受了刺激，加上劳累过度，没过几天也昏倒在工厂里，老板一点都不管。

朱照云说，那些老板都是没有心肝的。我在电子工厂干活时，一个十七岁的女工，食指被皮带夹断了，本来这是工

伤，可是老板硬是不承认，并且以解雇来威胁她。她只好忍气吞声，自己花钱治伤，养好了伤又来干活，老板连一分钱也没给。厂里有个干杂务的阿婶，一次干活时昏倒在地，领班不许工人离开岗位去救护她，任她倒在那里，过了很长时间才找人抬走，接着就把她解雇了。

有的老板根本就不把工人当人看。如电子厂的老板怕我们工人偷他的电子元件，出厂门时挨个搜身，有的门卫借机侮辱女工。这种人格上的侮辱，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“民主”、“自由”的实质。

日常生活艰难多

朱照云给我们介绍了香港的生活情况。她说：我们在香港挣钱还不算太少，每月平均收入一千三百多元港币，折合人民币四百多元，要在大陆那是高水平了。可是在香港，我们住的是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房子，每月房租就要三百五十元港币。买一斤蔬菜要三到四元，一张电影票六到八元，一张戏票得五十到一百元，理一次发七、八元。我们那个孩子上小学三年级，每月学杂费就得一百元。我们全家三口人，每月伙食费要花七、八百元，吃得还不好。

朱照云又说，在香港，没有安生休息的时间。我们每天从早到晚都在算计怎样干活挣钱，因为不想想方设法挣钱，就无法生活下去。付不出房租就会被房东赶走，交不起学费孩子就会被学校开除。金海的表哥，为了维持一家人的

生活，每天干两个班，在两家工厂打工，一个月才挣一千多元，日常生活费用还是很紧巴。那些家口多、负担重的人家，日子就更难过了。

吴金海插话说：照我们家现在这样的生活水平，要是 在香港，每个月光吃的就得花费一千五百元港币以上。还有住的，象这样两间房子，在香港每月租金至少也得一千元港币。再拿文化生活来说，香港影剧院很多，可是我们平时要看电影，都是买早场的票看些旧片子，因为没有钱买好票。香港有名的海洋公园，每张门票十五元，要是三口人去玩一天，车钱、饭钱加起来至少也得一百多元。临来时，几个朋友约我吃了一顿饭，四个炒菜，七瓶啤酒，就花了三百多元，还得给服务员十元钱小费。

说到这里，朱照云把刚刚收到的一封香港来信递给我们看。这是吴金海的大妹妹写来的，信中说：“我们原来那套房子的房租已从六百五十元涨到一千一百五十元了，上个月交水电费二百多元，付了房租就不能吃饭了。……”

前途可忧 晚景凄凉

朱照云告诉我们，在香港时，每天都有担不完的心事。不要说失业了，就是有工作时，也常常要担心会不会失业呀、千万别生病呀等等。我们刚到香港时，挣钱不多，交了房租就没钱吃饭了，只好每天晚上下班后，全家三口人一起到附近毛巾厂去叠毛巾。我们周围不少十几岁的儿童为了能

念书，只得白天去做工挣钱，晚上读夜校。

吴金海说，在香港工人是生不起病的，生了病不仅挣不到工资，饭碗也会打碎了。那里医药费昂贵，拔一颗牙要三十元港币，打一针青霉素要十五元港币，伤风感冒看一次医生就得上百元。所以一般工人得了病能挺则挺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上医院的。

吴金海说，在香港，有许多工人由于疾病、伤残、年老体弱等原因失去了劳动能力，无依无靠，只好流落街头，乞讨度日。香港有个叫“黄大仙庙”的地方，很多盲人、残废人聚集在那一带弹琴卖唱、乞食要钱，情景很凄惨。我亲眼见过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躺在那儿，身上盖了一张大红纸，纸上写着他一生的遭遇，以引起人们的同情，施给他几个钱。见了这些，谁不寒心？

吴金海最后说，就因为这一切，我们下决心回来了。虽然我们国家现在还比较穷，但四个现代化的前景是无比光明的。在香港四年的亲身经历，使我们切实感到，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一个工人幸福啊！

（选自一九八〇年一月七日《工人日报》，原载一九八〇年一月五日《解放军报》）

访港归来话制度

上海第二锻压机床厂厂长 徐文骥

今年三月，我作为我国出口机床赴港考察组成员赴港考察，历时二十余天。所见所闻，感触颇深，限于水平，又不免肤浅。不过，我想把这些感想写出来，或许会有补于我们的青年同志。

繁荣与动荡

我是第一次去香港，一到香港，第一个感觉就是香港的交通很发达，高速公路纵横交错，飞机不时起降，汽车川流不息，给人一种繁华的印象。接待我们的向导说，这十多年来香港发展确实很快，光对外贸易就增加十多倍，去年出口总额超过了四百五十亿港币。现在香港已是世界第七大港，可同时停靠一百五十艘万吨轮。考察期间，我们同那里的同行和用户进行了广泛的接触，感到他们既为繁荣所鼓舞，又为动荡而担忧，都有些忧心忡忡，说不准这种繁荣能够维持多久。

香港这几年发展的都是加工工业，几乎没有什么钢铁工

业和基础工业，原料、市场都得依赖别人。原料大多来自日本，产品主要出口美国，所以对美、日的依赖性特别大，有人自嘲说这是“寄生工业”，当地还有句行话，叫做美国日本起阵风，这里就要掀层浪。我们到港二十多天，电台、电视台一清早播送的就是美国市场行情，报纸每天来得很早，可打开一看也少不了这些内容，可见当地对美、日行情之关心。去年美元贬值，日元升值，就严重冲击了香港工业。这同我们独立自主搞工业，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，是根本不能比的。现在，美、日经济都在走下坡路，要在这么一个大的停滞环境中，寻求香港经济的进一步繁荣，应付日趋剧烈的国际市场竞争，对香港企业家人士来说，确实是大伤脑筋的事情，难怪他们要担忧这种繁荣能维持多久了。

通过这次考察，我们对把上海建成我国重要的工业、科技和外贸基地，信心更足了。香港的工业基础同上海是不能比的。就是现在，那里大多还是设备比较落后的小厂。在三万多家工厂中，十人以下的工厂占百分之六十点五，十人至一百人以下的工厂占百分之三十点五。那里的工厂，多数是客堂间式工厂，一间房子二十几平方米，放几台机床，一家厂有七、八间客堂间大小的工场，就算规模不小的中型厂了。设备虽不很先进，可他们采用先进技术的劲道却很足，所以，加工出来的产品不错。现在香港的纺织、成衣、玩具、电子手表、塑料、日用五金的出口量都已占世界首位。近年来香港发展快，有多方面原因，除了美国的扶助外，政局稳定也是重要因素。由于政局稳定，东南亚地区的游资大量流向

香港，促进了经济发展。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说，五十年代，香港同上海不能比，只是这十多年才赶了上来，但工业基础较之上海仍要落后、单薄得多。我想，香港是资本主义经济，无政府状态很严重，尚且能如此；我们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，又有现在这样一个基础，只要努力按客观规律办事，不是完全可能比香港搞得更好吗？

高工资、高物价

现在有些青年人羡慕海外的高工资，其实，他们只看到事物的一面。拿香港来讲，工资确实不低。一般工人月收入在一千元（港币，下同）左右，技术人员更多一些，可达二千元。可那里不少人成天还在为生活所困扰。

一是房租贵。香港是个岛屿，只四十平方公里大小，可要居住五百五十万人，故有“寸土如金”之称。一块凳子大小的地皮，在繁华地带要卖到一万五千元。一般房租，一平方英尺（约相当于0.1平方米）四元多。你住间十平方米的亭子间也得四、五百元。大多数劳动者，房租要占收入的二分之一。付不起房租怎么办？只得住出租铺位，今天住这里，明天住那里，同流浪汉差不多。

二是食品贵。说来真叫人不相信。青菜一斤是三、四元，时鲜菜一斤要卖六、七元，猪肉是十元一斤，鸡蛋论只卖，每只一元四、五角。咸鱼是三十多元一斤。工厂里不象我们这里有食堂，工人都得到外面小摊上吃饭，吃顿便饭少

说也要四、五元钱。在港期间，那里的朋友请我们吃了几次饭，吃到最后都是一道青菜，还热情地用筷子夹给我们吃，说是“吃点营养”。在上海，现在还不算蔬菜旺季，可菜市场里菜仍很多，到了那里才体会到“青菜也不贱”啊！

有些青年看到港澳同胞回国参观访问，身上都有照相机，就觉得我们不如人家，这也是只看了事情的一个方面。确实，由于加工工业比较发达，香港的工业品一般都不贵，电视机、照相机、录音机、电唱机、电风扇等等都很便宜，所以，工人家庭都有这些东西。但那里的工人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？他们说，电视机买了一架可用多年，不用天天去换新的；而蔬菜蛋肉却是天天要买的。天天需要的东西不断地贵，生活有什么保障！比起我们有些青年来，他们看问题不是还多一些辩证法吗？

几多欢乐几多愁

比生活，我觉得，不仅要比生活水平，还要比生活有否保障。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有体会，在旧社会最怕两件事，一是小时怕孤苦伶仃，二是老时怕无依无靠。我们的青年对此没有体会，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，生老病死有保障，这两怕都变成不怕了。这次到香港，发现那里这两怕仍很严重。香港这几年由于经济发展较快，人口又控制得紧，所以劳动力比较紧张，一般找工作还是找得到的。当然要找合适的工作，如果没有路子那也就难了。但即使这样，据香

港当局公布的材料看，目前仍有六万多老人处于失业和无家可归的状态，报纸上经常为这些人的惨境呼吁，可月复一月，一如既往。我们接触了一些老人，他们听到国内的情况，都由衷地说社会主义好。

香港的工厂，一般都有严格的制度。我们看了几份厂规，发现除了进厂要保人和犯章开除这两条外，其它都是“不”字开头的，有许许多多的“不准”。我们参观了几个厂，工人做工都很卖力，很少分心，我们走过去，他们看都不看。其实，不卖力也不行，“饭碗”随时都有可能敲掉。厂里一般采用两种办法管理工人，一是机器管人，大多是流水作业，工人稍一休息，产品就积压起来；二是人管人，管理员（工头）不时游弋，谁给他发现“偷懒”，上报上去，轻则罚金，重则解雇。一些回国探亲、访问过的工人，说起自己在工厂里地位之低，都是很动感情的。无权之时的苦恼，我们一些“身在福中不知福”的年轻人是体会不到的。

俗话说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生老病死。不生病的人大概是没有的。香港工人最怕生病，尤其怕生慢性病。一生病，既无工资，又要支付医药费，而医药费又特别昂贵。所以，有亲戚在广东的，得了慢性病，有的就往国内跑，因为在祖国看病便宜啊！

迷信风行盖文明

初到香港，觉得那里很文明，马路上很少有纸屑，也没

有随地吐痰的，行人过马路都遵守交通规则。后来，到工厂参观，觉得厂里也很整洁，可漂漂亮亮的办公室里，却醒目地放着象菜橱那样的柜子，上面树着关云长的塑像，下面则是龙神土地（又称狐仙）的偶像，两旁各配两支电蜡烛和土香。这样的东西，在车间里也有，至于老百姓家里，那就更多了。关云长是讲义气的，狐仙神是保佑太平的。家家户户立佛拜神，不但老百姓这样做，连有些家财万贯的资本家也不例外，足见人们对命运的担忧和对安居乐业的神往。这种情况，说给我们的青年人听，一定会觉得可笑。是的，对一个在生活、工作都有保障的新社会里长大的青年人来说，又怎么会有那种随时担忧失业和破产的心情呢？

不仅家家立佛，祈佑太平，而且商店里还有“横财飞来”之类的匾幅出售。可惜，横财飞来的机会毕竟罕见，而横祸飞来的消息倒不时可闻，每天的报纸就登着不少关于抢劫、凶杀、绑架、强奸的新闻。稍为富有一些的人家，门外都装有铁门，你要进去，先得在门外挂电话，待主人同意后才能入内。据说，这是为了防抢。即使这样，仍难免遭受袭击。那里的同行告诉我们，晚上单独外出是很危险的。他们外出，一般身边都放些钱，数目不多不少。多了，遇抢可惜；少了，抢者不满，拿了钱还给你一刀。横祸既然不时飞来，难怪关云长、狐仙在香港如此吃香了。

有比较才有鉴别。访港归来，漫步在树木郁葱的羊城街头，呼吸着清新沁芳的南粤空气，我们都觉得胸宽心坦，仿佛人也高了一截。我们的祖国，眼下虽然经济技术还比较落

后，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较低，但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，有处处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的领导，有亿万勤劳勇敢的人民，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向前看，齐心协力搞四化，那末，美好的未来是指日可待的。

（选自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三日《解放日报》，该报记者黄京尧整理）

探亲归来话香港

——访抚顺市妇联委员、安全仪器厂
青年女工傅梅芳同志

赵 旭 李 丹

深秋时节，我们访问了抚顺市妇联委员、安全仪器厂青年女工傅梅芳同志。

小傅的爸爸是香港一家皮革公司的董事长，妈妈和另外两个姐姐、三个弟弟都在香港。她从小过继到大爷家。一九七四年八月和一九七八年四月，她曾两次去香港探亲，共住了十个月。回来后在抚顺作了三十多场香港见闻的报告，颇受群众欢迎。当我们说明来意后，小傅讲了去香港探亲的一些见闻和印象。

普通工人生活没有保障

小傅说：香港号称“自由世界商品橱窗”，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这里搞商品竞争，技术先进，工业发达，管理有一套经验，生产效率高，值得学习。但是，资本家把工人当成工具，工人生活没有保障，这是群众最反对的。比如工资